

我的三次创业: 私企第一人眼中的营商环境变迁史

■ 本报记者 王敏

他在胡耀邦的“钦点”下成立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私营企业,他在国内对于私营企业政策出现摇摆之时东渡日本开辟商业竞争“第二战场”,他在日本经济遭受冲击时重返祖国开拓事业的新旅程。

他就是被称为“私企第一人”的姜维,他的创业史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后营商环境的变迁史。

第1次创业:

从个体户到首位私营业主

《中国企业报》记者面前的姜维中等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1980年,从部队复员的他被分配到大连当地的文化部门。时逢“四人帮”刚粉碎,国家百废待兴,苦等了8个月,工作迟迟不能安排。等待的过程中,他试着在大连动物园门口摆起了小摊,弄了个“照照看”摄影亭。所谓的小摊也就是一架旧式的照相机和一个招揽生意的小桌子和小板凳,开业的本钱还是妹妹几年来做临时工赚来的400元。开始很多人不解,不时遭到嘲笑甚至工商部门的刁难,但姜维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当时社会的大氛围下,个体户就是人下人,没人瞧得起。1983年8月30日,刚冲洗完胶片的姜维正在吃晚饭,广播里传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胡耀邦说,从事个体劳动同样是光荣的,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彩豪迈的事业。胡耀邦鼓励个体、私营老板们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

姜维告诉记者,他那几天和一些从事个体的伙伴们翻来覆去地念《大连日报》上胡耀邦的讲话,边念边哭。“讲话给我一种力量,让我有了新的生命和新的感觉。”姜维回忆说,正是这篇讲话让社会上对个体户的看法有了些许转变。

1984年,生意一派兴隆的“照照看”摄影摊亭升格成“姜维影社”。这时,一位廖姓港商到大连视察,他在一个场合见到姜维,这次见面改变了姜维的人生。廖姓商人愿意以成本价19.8万元转给姜维一台先进的彩色洗印设备,可19.8万犹如天文数字,对当时的姜维来说无疑是个大难题。

在那个贪污一万元就要枪毙的年代,姜维想到了和外商合资。但当时的《中外合资法》规定,个人不得与外商合资,因为个体户没有法人资格,不能在协议上签字。在大连找不到门路的姜维不愿服输,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跑了多少趟国家部委,姜维已经记不清了,“看门的大爷要看



中国第一家合资私营企业——光彩实业有限公司 王敏/供图

介绍,当时还没有身份证,没爹没娘的个体户没地方开介绍信,结果不要说咨询政策,连上访都不接待”。

姜维说,记得那年5月4日,一位朋友送他一张人民大会堂青年联欢会的票,事情才有了转机。他见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后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全国政协副主席尚华分别听取了他的汇报。

正在姜维在住处忐忑不安等待消息时,一天,王任重的女儿王晓黎和一位中年人骑着两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到他的住处,把他准备的报告材料拿走,他才看到了一丝希望。这个中年人正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

姜维预料的没错,胡耀邦一句“让他试办一下嘛”的话,事情最终有了转机。1984年11月9日,他得到了国务院特例批准的、由大连市工商局颁发的全国首个私营企业执照。为了纪念胡耀邦“光彩”讲话,姜维把自己的企业用“光彩”命名。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稿,许多国家的报纸关注了此事,给予了报道和评论。称此私营公司的成立是“姜维人生一小步,中国迈了一大步”。

第2次创业:

东渡日本的无奈与艰辛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民营企业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不得不戴上“红帽子”——挂靠在国家或国企门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产权清晰”无法回避,私营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掉“红帽子”是必然趋势。

但在剥离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磨难和意外。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涂景新案。1993年,涂景新把自己的公司戴上“红帽子”,挂靠在海南一家国有公司——海南机设公司门下。涂景新的公司后来越做越大。1999年,他想把公司从国企门下脱钩,结果被国企告上法庭。最后,涂景新以侵占国有资产罪被判刑。

涂景新的妻子走投无路之时,通过朋友找到了姜维,姜维又辗转把他的材料转给了胡德平。胡德平得知情况,专程去海南调研,并与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反复讨论此事。在胡德平的努力之下,2006年,被关押了7年的涂景新终审被判无罪释放。

那个时候,姜维的事业已经做得很大,陆续成立了光彩制药、光彩遮阳伞厂、光彩电焊厂等。

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姜维的人生路径。一位日本议员邀请姜维组成一个代表团去日本考察。此时正值1989年的春天,在日本大阪机场,姜维率领的第一个私营企业代表团巧遇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此后,姜维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洽谈生意,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不易。

1995年10月25日,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在京成立。作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光彩中国实业集团董事长、中国私企第一人及光彩事业第一人,姜维一直致力于光彩事业。

1994年,他准备在大连一号地带着一个光彩大厦。楼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在此建世界儿童公园,所有的项目都得下马,大楼停工了。200多天,又接到通知,可以继续建楼。辗转反复中,姜维失去了很多时机,由此损失了几千万元,遗留的问题至今也未解决。

万般无奈之时,姜维来到了日本,专心做日本的光彩事业。1995年,中国光彩事业日本株式会社正式成立,专门为中国私营企业走出国门服务。4年之后,1999年,在王兆国和胡德平的关心下,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正式成立,这是光彩在海外成立的第一个促进会,也是迄今为止正式得到承认的一个。他们集中了日本的华侨企业家,回国投资做项目。

第3次创业:

重返祖国的光彩与深意

在日本的事业成熟后,姜维难以分身,就把国内红红火火的制药、制

“

那几天,姜维和从事个体的伙伴们翻来覆去地念《大连日报》上胡耀邦《怎样划分光彩与不光彩》的讲话,边念边哭。

伞、电焊企业全部转给了朋友或合伙人,全力致力于日本的事业。

此后,日本经济逐步进入下行通道,很多日本企业纷纷找到了姜维,希望能通过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开展同中国生意伙伴的合作。

2008年,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让雷曼兄弟轰然倒塌,雷曼兄弟下属的迪斯尼制作公司也随之倒闭,日本的分公司也要跟着倒闭。他们找到了姜维,希望他能接公司下来,移师中国。

中国还没有这方面的制作公司,姜维思虑再三,得到了太太的支持,把公司买了下来,搬到了中国,并把公司命名为“北京176光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的10个制作专家也一起来到了中国。

之所以叫“176光彩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姜维说是为了感谢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强国的号召和支持。正是这次会议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让姜维找到了自己事业的契合点。按日文的意思,“176”还是“一起努力、大发展”的意思。

2011年,公司在北京举行了正式进入中国的仪式。

这期间,姜维得到了北京市文化资源委员会的支持,这为他大力开展在中国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便利。

2013年8月30日,光彩事业举办了纪念胡耀邦同志发表“光彩讲话”30周年座谈会,姜维重新穿上他那套灰色的中山装。

他激动地说:“30年前,是耀邦的光彩讲话让我这个个体户有了挺起腰杆做人的尊严;30年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我这个个体户依然为自己一直坚信于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而骄傲。”

姜维告诉记者,时逢十八大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亲历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私营企业家,更应该珍惜民营经济来之不易的一切,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永远铭记三个字“勿忘本”。

【“醉美普洱”系列报道之三】

普洱市加快清洁能源 基地建设步伐



糯扎渡水电站大坝

■ 李海权

《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支持普洱加快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普洱建设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也将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普洱依托丰富的能源优势,围绕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把清洁能源产业发展作为支柱产业来抓,以水电开发为主,积极发展新能源,全市清洁能源产业实现较快发展,普洱成为了“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重要能源基地。

普洱是全国水能资源富集的地区之一,全市年平均自产水资源总量326亿立方米,占云南省水资源总量的15%,居全省第一位。澜沧江、怒江、红河3大水系100多条4级以上河流穿境而过,可开发水电资源的河流有62条。全市水资源总量829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居全国之首,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500万千瓦,占全省蕴藏量的15%,其中已探明可开发利用的水能资源1200多万千瓦,是发展清洁能源最理想的地区。

近几年来,普洱市以水电为主推动清洁能源发展。引进实力雄厚的华能澜沧江公司开发糯扎渡水电站,北京大唐国际开发李仙江、云南滇能集团开发泗南江、国电集团开发阿墨江、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威远江等水电站建设,带动各流域开发建设梯级电站。其中华能集团已在普洱市境内开发澜沧江流域水电资源444万千瓦,大唐集团已开发普洱市境内水电资源106万千瓦。

目前,普洱市已建成水电站122座,装机规模合计约680万千瓦,其中:中型水电站13座、小型水电站109座,在建水电站13座。华能澜沧江糯扎渡水电站装机规模585万千瓦,装机容量居全国第四位、云南省第一位,是实现国家资源优化配置,全国联网目标的骨干工程,是实施“西电东送”、“云电外送”战略的基础项目,目前糯扎渡水电站已投产发电5台机组,计划2014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其它在建的勐野江水电站、普西桥水电站等大中型水电站计划于“十二五”期间全部建成投产。

在大力推进水电开发的同时,普洱加快推进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建设,新能源开发有重大突破。中广核普洱澜沧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装机规模4.8万千瓦澜沧县甲倭波风电场、大唐普洱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装机规模4.95万千瓦的墨江县联珠风电场开工建设,云南裕隆风能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宁洱县硝井风电场已开展前期工作。装机规模3万千瓦的景谷生物质发电项目于2013年8月核准,今年内可开工建设。同时,已建成全省唯一正常运行的秸秆气化站1座。以农村户用沼气建设为重点,广泛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节柴代柴,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和改善了生态环境。

普洱市在电源建设快速推进的同时,不断完善电网结构,加快电网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基础设施保障。普洱已形成覆盖城乡的大电网,2012年底,普洱市拥有500千伏变电站1座、500kV开关站1座、220千伏变电站3座、110千伏变电站18座。500千伏线路总长1089千米,220千伏线路总长1106千米。同时,农村电网建设已见成效,全市103个乡镇(镇)、998个行政村100%通电,已全部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十二五”期间,普洱电网规划新建糯扎渡送电广东±800千伏换流站1座、500千伏开关站1座、220千伏变电站2座。

今后,普洱清洁能源发展将以水电为重点、风电和生物质能发电为补充,着力延伸产业链,打造好国家“西电东送”、“云电外送”的清洁能源基地。到2015年,力争实现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000万千瓦以上,发电量400亿千瓦时以上,产值100亿元以上。一是重点推进水电发展。以澜沧江干流水电开发建设为中心,澜沧江、李仙江、怒江支流水电开发为重点,加快推进糯扎渡、普西桥、忠爱桥、长田、勐野江5座大中型水电站建设,争取早日投产发电。合理开发曼老江、者干河、南朗河、勐嘎河等小流域梯级电站。二是稳步推动风能、生物质能发展。加快推进墨江联珠风电场、澜沧甲倭波风电场、宁洱硝井风电场建设,探索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推动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三是延伸清洁能源产业链。充分开发利用水能资源建设水电站水库,同时发展清洁能源基地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天然渔业等产业。

声音

孙大午:仍有官员把企业家当待宰羔羊

■ 本报记者 王敏

“我的很多朋友移民了,他们还让我移,我说我不走,因为我太爱这个地方了。”在由大午集团和天则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学术论坛上,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深情地说。

让孙大午难以割舍的是大午城,“天是蓝的,空气是透亮的,人是淳朴的,我舍不得这里。”

“我的朋友们为什么要成群结队地移民呢?首先要问一下,这个社会对民营企业是肯定的吗?在一些官员眼里我们就是猪,可以随时宰杀,又是一头待宰的羔羊,心里有很多的屈辱感。”孙大午一语倾泻道破了企业家移民的苦衷。

“最近有人说在商言商,我说他这是恐惧政治,是一种对政治的无奈,你说他根本不关心政治吗?”孙大午像是在自问自答,“这是一种无奈,是一种

更深沉的关注,有一种深沉的担忧和恐惧。”

“我们不关心政治吗?什么叫政治?在我思想当中,政治就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政治根本就离不开你,它就像空气,就像水一样,每个人都需要,都离不开。不信我们看一看,当你出生在农村的时候,不存在城市户口,这是不是政治?当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念政治课本,我们读历史,我们想去做一个红色接班人,这是不是政治?”

孙大午说,大午集团成立30年了,1995年就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2003年企业固定资产过亿元,企业做错了什么呢?

令孙大午耿耿于怀的正是2003年那个著名的孙大午非法集案案。“当企业家大量的精力不得不用在维护‘关系’上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当企业家在辛辛苦苦做事的时候,却怀着一种屈辱感、一种不安全感,那又是怎样难以言表的一种境况呢?”

所以,孙大午说:“我们应该关心政治,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和谐,我们希望能够发展得快一点,发展得好一点。”

今年整个经济是下滑的态势,一些企业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孙大午说,不好的形势下也有很大的商机。自己的企业就适应得不错,今年还有向外投资扩张的态势。

“但扩张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孙大午谈到了自己的肥业公司,今年想扩产到年产八万亩甚至十万亩。这个肥业公司已经20多年了,可是当建了厂房想扩大规模的时候,电力局不给安装变压器,理由是没有土地证。“而在这块土地上大午集团20年前就建了厂了,难道说土地不合法吗?”

孙大午去了电力局,问是怎么回

事,是不是电供不应求?对方说电根本卖不出去,他们也想多卖电,也想卖给大午,但是政府有文件,必须有前置手续才能卖。“这样一环套一环的关系,逼着人要耗大量的精力去协调。”

孙大午说,现在的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难道不是需求?不是市场?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机遇吗?”

“如果国家把这些彻底放开了,如果我们的土地承包三十年变成一百年,土地可以自由流转,可以出租,可以转让,可以抵押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发展得更快,上述问题也可迎刃而解了。”

孙大午说,政策就是机遇。“其实回想一下,企业家做了点事不是单个人的成就。没有改革开放政策,企业家什么也做不成。再往深里说去,当地有个好政府,有个好官,在这个情况之下,企业家才能有所作为。”